

初盛唐时期的 盛世理想与文学

◆ 李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初盛唐时期的 盛世理想与文学

◆ 李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李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04-7561-3

I. 初… II. 李…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016 号

责任编辑 雁 声
特邀编辑 立 早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375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唐代以前的盛世观念	(19)
一 关于盛世的观念和理论	(19)
二 儒家学说中对盛世的构想	(22)
三 汉代的皇权政治与盛世	(44)
第二章 盛世的历史基础与天命观	(70)
一 反思历史与寻找正统	(70)
二 历史根基的体认和皇极的重振对文学的影响	(99)
第三章 盛世氛围的营造	(128)
一 礼乐活动的开展和盛世意识的强化	(128)
二 祥瑞的出现与雅颂文体的兴盛	(168)
第四章 王道政治与盛世理想	(195)
一 盛世与王道政治	(195)
二 王道政治作为思想问题在初唐的展开	(199)
三 开元盛世和王道政治	(223)

四 王道盛世理想下的田园诗歌·····	(248)
第五章 王霸之道和盛世的武功·····	(267)
一 王霸之道与武功的关系·····	(267)
二 王化的推行与武德的主题·····	(277)
三 边塞的古今形势和民族精神·····	(298)
四 王霸大略视野下的诗歌·····	(319)
第六章 开元时期政治风气的转变·····	(341)
一 中宗中兴与社会反省·····	(341)
二 地方庶政与州郡官·····	(355)
三 恤灾与关注民生·····	(391)
第七章 盛世时代的“诗仙”与“诗史”·····	(412)
一 盛世的际遇与浪漫精神·····	(412)
二 盛世的政治理念和诗史精神·····	(432)
结 语·····	(444)
主要参考文献·····	(447)
后 记·····	(454)

绪 论

—

唐代文学以诗歌为主，被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是经过长期研讨之后形成的结论。相对于诸如周秦汉晋、宋元明清等其他阶段的文学史来说，唐代文学的这种分期显得非常特殊，而且意味深长。因为中国文学发展到唐代的时候，逐渐舍弃了汉魏六朝以来意义相对宽泛的杂文学观念，而属于纯文学领域的散文、词曲、小说、戏曲等体裁样式还在初步形成和酝酿的阶段，只有诗歌艺术在诗骚传统的基础上，经过汉魏六朝以来对五言、七言诗的集中研磨与探索，逐步走向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成熟。唐代文人的文艺精神和热情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领域，诗歌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最强势的地位。文学创作样式的相对集中和单一，使得对这一时期文学史概貌的辨认和把握比较容易，以此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也就更清晰有据。而且，唐代文人参与诗歌创作的激情带有较强的社会普遍性，如果把作家的出现和作品的出现看做是不断发生的文学事件，那么，在有唐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此类文学事件发生的密集程度及其内在的相关性、连续性则是前所未有的。数以千计的作家共同在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内持续从事同一种艺术活动，其中表现出的艺术个性

与共性、普遍性和阶段性都非常鲜明，并且能够形成一个内在构成异常丰富、内在联系相当紧密的文学史序列。从这个角度上说，用分期学的方法来认识和研究唐代文学的发展是合适的。

关于唐代文学的这种分期，除了从时间意义上进行判断之外，还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对政治文化兴衰穷通的评价。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本是封建王朝前后相继、彼此更替的变化史，改朝换代成为中国历史兴衰起伏最自然的标志。思考一个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原本就是传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评价所遵循的逻辑。每个王朝，无论其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大概都经历了从勃兴初建走向鼎盛强大，然后由于内外矛盾的加剧而中衰，最后走向灭亡的历史。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包括文艺学术、世情风俗等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兴衰正变，本身就是政治兴衰变迁的重要内容。《礼记·乐记》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①明确地表述了政权和文艺在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中那种高度契合与互文效应。因此，政权的强弱、社会的治乱，也构成了对古代文学史上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分期的重要参照。唐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四个时期，分别照应着初唐政治的励精图治、开元时期的社会全盛、中唐时期的危机重重和晚唐时期的日薄西山，“初”“盛”“中”“晚”这四个字准确地表达了在王朝延续的时间轴线上，政治和文化事业升降变迁的曲线图像。尤其是“盛唐”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被提出，并与“初”“中”“晚”三个阶段并列，使得这种分期方式的双重意义被注解得十分显豁明白。

经过初唐的发展，与唐代国力的鼎盛和社会的全面繁荣相一

^①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6页。

致，盛唐诗歌也创造了激动人心的艺术成就，表现出昂扬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成为真正的诗国高潮。这也是“盛唐”所具有的更加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当时的文人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全盛的时代带来了怎样的诗歌精神和激情，并准确地把握了盛唐诗歌的艺术精髓。在李白高声讴歌他的时代，“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①的时候，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就敏锐地指出，盛唐诗歌之所以超越前代，主要是因为“声律风骨始备矣”。^②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中，与初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相区别，独举“盛唐体”为典范。认为盛唐诗人以“妙悟”为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并提出“盛唐气象”的概念来概括盛唐诗歌的整体风貌。^③“盛唐”之“盛”，是来自诗歌艺术属性本身的评判。

严羽对唐代诗歌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辩体”学意义上的诗歌分类，后来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总结前人的观点，就不同的诗体，按照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对唐代诗歌史进行了划分。严羽的“五唐体”就从“辩体”学最终发展为唐代诗歌的分期学，以风格“辩体”为诗歌分期提供内在的依据。由此以后，唐诗的四个分期，成了研讨唐诗的一个基本起点，对盛唐诗歌艺术也产生了诸如神韵、格调等带有古典诗学理论特色的解释。盛

① 李白：《古风》其四十六，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

② 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所附录《河岳英灵集点校本》：“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7页。

③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页。

唐作为诗歌艺术发展的最高潮也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广泛的认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基本结论，所谓“唐代文学，莫盛于诗，诗莫盛于开元天宝。无诗，则唐文学不感，无开元天宝，则无盛唐”。^①

二

古典时期对盛唐诗歌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艺术创作的技巧和规律上，这与传统诗学研究主要在诗歌审美情趣投合的基础上以学习诗歌写作为目的有必然的联系。近现代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研究，对影响诗歌艺术发展的社会学原因及时代政治、文化等因素给予了特别的强调，注重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因此，从这个角度探索盛唐诗歌之所以兴盛，之所以绽放着特异的艺术光彩，就成为特别受人关注的学术问题。人们对盛唐诗歌的认识也随着时代精神与学术观念的变化而有不同的阐发。五四以来，由于受到新青年解放思想的时代风气的感染，开始礼赞盛唐诗歌充满的积极、热情、向上的精神风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因此，就产生出“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其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明显地表现出种种浪漫的倾向”。苏雪林《唐诗概论》中认为盛唐的诗歌就像春天的生命，“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产生出一种“春花

^①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第四编“近古文学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02页。

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① 其实，古代诗学研究者也曾把盛唐诗歌比作春花，但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盛唐诗歌和初、中、晚诗歌，有如四季风光，可以平分秋色，不必互分轩轻。^② 可是在现代学者那里，受到进化论等思潮的影响，春天和青春的主题结合在一起，成为宣泄个性精神和生命自由的基本主题，所以，在盛唐诗歌的研究中，强调从时代的精神风貌来阐述诗歌所呈现的艺术状态，将精神史与艺术史的思考更多地结合在一起。当此之时，李白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个案，因为从解放精神、追求自由这一方面来讲，李白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思想对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论，尤其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发展状况对文艺活动的影响规律，是解释文学现象必须遵守的逻辑。因此，探讨盛唐诗歌高潮出现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更加成为一个明确的问题。林庚先生在 1958 年发表了题为《盛唐气象》的重要论文。^③ 文中首先肯定盛唐气象反映了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而这一精神面貌主要来源于“人民的胜利”所引发的时代自

① 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五章第一节，“盛唐诗歌综合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7 页。

② 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外篇下：“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6 页。

③ 此文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58 年第 2 期，后收入《唐诗综论》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49 页。

豪，这就把精神内因的探讨和时代的阶级矛盾等问题连接起来，为盛唐气象找到了历史发展的现实机缘。而作为艺术风格的盛唐气象，则表现出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林先生结合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探讨了“建安风骨”在盛唐时代被逐渐激活的过程，也就是说，建安诗风所反映的解放的力量，作为艺术的优良传统，被盛唐诗人所接受，而建安时代的苦难流离，被盛唐社会的积极发展和人民胜利的时代骄傲所取代，把“建安风骨”催生为“盛唐气象”，表现为一种“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和新的时代风貌。这就使《沧浪诗话》所提出的“盛唐气象”得到进一步充实，成为时代精神和艺术特性的概括。这虽然是一篇论文，却涉及了对“盛唐诗歌”研究的多种方式。首先，文章中坚持了从历史的阶级基础与发展状况出发研究文学发展的思路。其次，林先生避免了简单运用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等概念与文学反映论的生硬比附，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抓住了“时代精神风貌”这一中介性的范畴，作为历史背景与文学风貌之间的理论过渡，而从“时代精神风貌”来进一步阐明盛唐诗歌的艺术色彩，则似乎还带有“五四”学术传统的一些遗意。再次，林先生还细致辨析了“盛唐气象”在文学史上的艺术渊源和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被实际转化的机缘，完成了对“盛唐气象”的总体把握和概括。

其实，林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早在1954年发表的《诗人李白》中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当时只是把李白作为盛唐诗歌的典型代表进行个案研究，而实际上却关涉到对整个盛唐诗坛的把握。在《诗人李白》中，林先生就面临着如何解释李白这样一位天才的、处在云端的诗人之所以出现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的问题。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条件，需要首先考察盛唐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来确定人民

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要求，然后以是否具有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作家的主要标准。具体来说，第一步应该探讨盛唐时期的繁荣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二步应该探讨作为诗人的李白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处境和精神面貌给作为艺术创造者的诗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只有通过这样的逻辑，一个诗人的出现及其创作的现实基础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对于第一个问题，林先生首先把唐代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人民的胜利”，这就是说作为“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的唐代，符合了人民的愿望，满足了人民的需求。时代与人民的关系，初步得到确立。对于第二个问题，林先生提出了李白的“布衣感”这一新的概念，所谓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权贵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利用布衣阶层的特殊性格和进步性，把壮浪恣纵的天才和盛世时期人民的骄傲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逻辑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一个封建王朝的鼎盛时代和“人民的胜利”之间是难以构成逻辑联系的。因为封建时代毕竟不是人民掌权当家的时代，而是人民处于被压迫和被统治的时代。如何把属于封建王朝的盛世，理解为受压迫的人民的骄傲，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布衣感”虽然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新思维，但是，通过对布衣阶层的生活现实与精神追求的考察，把他等同于人民或者间接与人民牵连起来，确定其阶级的属性，也是不容易做到完全令人信服的。大多数人反而认为布衣阶层，都是为了进入统治集团内部而努力不懈的。

正如我们在前文说到的，要求在阶级论的历史观中解释文学的艺术现象，是当时那个新的时代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因此，林先生面临的质疑，乃是这种理论思维本身和古代文学研究之间如

何适应的问题。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围绕李白产生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文。这些文章都试图合理运用新的文艺理论来研究李白，虽然观点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方法则是相似的。范宁先生直接运用诗歌思想内容的现实反映论来考察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唐代的阶级矛盾和人民的生活，都在相应的篇章中有所表现。^①齐云先生又从劳动人民的形象塑造上，考察李白诗歌的现实性。^②而认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不是“顺感”盛世的辉煌成就而取得的，而是“逆感”盛世，从对当时不合理的现实的反抗中产生的。这种看法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同，结合李白一生仕途上的遭遇，把追求理想和怀才不遇的矛盾，看做是反抗时代“不合理”现象的表现方式。因此，浪漫主义就取得了“革命性”的精神，从而符合于时代的要求。与这一观点相联系，把盛唐时期以开元末年为界分为矛盾缓和期与矛盾尖锐期，更加肯定了李白在天宝政治环境中的激愤和反抗精神，具有非常强烈的进步意义。张志岳先生在《略论李白》中，从家世生平、思想性格入手，进入对李白诗歌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的讨论，进而对此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多种思路进行检讨。^③认为：“有很多论者对这些为数很少的直接触及到社会问题、现实意义和人民性比较显著的诗篇，往往不惜多方引证，反复阐明；而对那绝大多数没有直接触及社会问题的作品，则视若无睹，或者只广泛的谈谈它的

① 范宁：《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发表于《文学遗产》第 72 期，《光明日报》1955 年 9 月 18 日。收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51—162 页。

② 齐云：《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一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 期。后收入《李白研究论文集》，第 163—188 页。

③ 张志岳：《略论李白》，发表于《新建设》1957 年第 1 期。后收入《李白研究论文集》，第 189—202 页。

艺术风格而避免作思想内容的分析。”^① 由此将李白诗歌以开元末年分期，而着重强调在唐王朝政治日益腐败、矛盾走向深重的背景下，李白创作的丰富性及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认为“怀才不遇和人生如梦”（裴斐先生语）的主题和“当时受压迫的广大人民的情绪起着和谐的共鸣”。^② 李白诗歌的人民性则得以确立，而李白诗歌创作的浪漫手法和夸大修辞，也就得以相应的说明。这基本上就是 50 年代李白研究的主要任务和收获。

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将他作为一个典型而富有个性的作家加以研究，自然会对盛唐诗歌的总体把握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肯定阶级矛盾和人民斗争的理论话语中，封建王朝的“盛世”反而被忽略。因为阶级矛盾激化的时期促成了文学的繁荣，而阶级矛盾缓和时期的“盛世”却被简单地加以评说。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理论下，如何解释传统历史学说中的“盛世”时代和文学史中的“盛唐”之间的内在关系，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林先生在 1958 年发表《盛唐气象》一文，实际上是对唐代“盛世”和“盛唐气象”之关系这一问题的重提与再判。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理解，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并且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下，学者们怀着极大的冲动讨论“盛世”和“盛唐气象”的关系，实际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机遇，包括“人民的胜利”、“人民的骄傲”等话语，折射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受。这也就是杜晓勤老师指出的，“由于作者本身也是一位诗人，当时又处于一个朝气蓬勃的、上升的解放中的时代，所以文章充满激情，对盛唐气象的理解也就

① 《李白研究论文集》，第 198 页。

② 同上。

准确、深刻得多”。^①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地看到，在这一番争论中，无论是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还是针对整个时代的综合性研究，人们直接或间接关注的主要问题，确实是为盛唐诗歌及其艺术气象寻找现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史现象的“盛唐”如何与作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盛唐”之间达成合理的共建机制。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是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逻辑关系的考察，成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渐渐放弃了单纯从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状况的完整分析与全面评价入手，来确定盛唐诗歌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做法，而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文学繁荣和诗歌艺术产生巨大飞跃的特殊性。这也就是王水照先生《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引发关于唐诗繁荣原因大讨论的背景。^②王文在分析唐代经济繁荣、庶族地主阶级的社会作用和科举制度等方面对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时，不但着力寻求这些因素影响文学发展的具体方式，而且注意探索影响文学发展更密切、更具体的近因。这就预示着对唐代诗歌乃至“盛唐气象”的研究，可以从各个特殊的、具有创新性的角度进入，深入分析当时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构成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巧妙的角

① 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五章第一节，“盛唐诗歌综合研究”，第289页。

② 王水照在《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兼答梁超然、皇甫烽同志》一文的结尾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例如艺术生产的发展之不平衡关系’这一著名命题后，曾说：‘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他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以上对唐诗繁荣原因的补充说明，离‘解释明白’相距尚远，有的问题如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等还未涉及，我们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原文刊载《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1980年出版。本文引自《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里比较明白地透露出研究诗歌繁荣原因的“特殊性”，已经成为当时的学者的自觉意识。

度、细致的梳理、把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做到充分的实证性说明，就成了八九十年代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模式。产生了以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先生《唐代幕府与文学》等为代表的专著，以及业师葛晓音先生《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起》等重要论文，同时，佛教、道教、外来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也都列为专题进行探讨。唐代社会的总体盛况从这些制度层面、文化层面被逐渐分解，^①把盛唐文学发达的原因开掘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取得的成果也更加丰硕。

盛唐文学研究发生这种转变的同时，历史学研究也从思想、政治、军事、文化等具体方面切入到历史本身的问题中去全面思考唐代社会的全盛状态，^②并不急于去对当时的社会进行定性式的评价。并在现代学术观念和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开放性地开展唐代盛世中各个层面的问题。“盛世”的观念就在这种研究策略中形成一种潜在的交汇和互证。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则是，“盛世”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整体的概念，是否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是否还能够直接构成对“盛唐诗歌”乃至“盛唐气象”解释的可能性呢？

① 葛晓音先生在《诗歌高潮与盛唐文化》一书的“自序”中总结这些论文，“主要是想从文化的某些角度切入，为盛唐诗歌的繁荣找出若干被忽略的原因”。表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长期以来追寻的基本问题，可以看做是这一代学人对“唐诗繁荣原因”的深层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李治亭、孙玉良：《中国历史五大盛世·总序》中总结盛世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包括军事实力）强大，文化昌盛。”黄中业：《唐开元盛世》总序，第3页。荣新江在《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总序》中说：“共同探讨这一伟大的时代，把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展现给世人，把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三

在中国古代史中，“盛世”可以看做是一个在人们的观念中持续存在的流行语，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比较顽强的“盛世”情结。乱世之人，盼望海晏河清的太平岁月，营造理想王国的乌托邦。如建安诗人王粲在“遭纷浊而迁逝兮，漫踰纪以迄今”的遭遇中，明确地表达了“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的愿望，^①这实际上就是汉末大乱之后人们企盼“王道”盛世的共同心理。而在衰世陵夷之际，回顾往日的峥嵘岁月，甚至用溢美之辞，歌颂逝去的繁华，为了慰藉失落的心情，寻找迷失的世界，不惜把盛世的历史放大到想象的极致。从西周的成康之世，到上古三代，甚至到羲皇以上，之所以被儒家描述为黄金时代，就源自于这种“盛世”情结。当然，“盛世”理想的存在除了这种将来时态和过去完成时态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种现在进行时态。因为，在一些时候，社会的相对安定与发达，或者改朝换代引起的政治改良的新兴语境，往往会促使人们将“盛世”的全部想象投注到部分的现实变革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润色鸿业、粉饰太平的政治学修辞，为统治阶级和某些特殊阶层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盛世”也可以成为一个从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乃至文化领域描述“现实”的流行语，而盛世的“现实”也可以根据某种理论方式，按照人们对“盛世”的主观愿望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建构。

① 王粲：《登楼赋》，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4页。